文库

中华文明的起源

——从史前到先秦

ZHONGHUA WENMING DE QIYUAN
CONG SHIQIAN DAO XIANQIN

吴涛◎著

科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和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中华文明的起源
——从史前到先秦

吴 涛 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图书馆藏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先秦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时期，先秦史始终是中国史研究的重点。本书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从文明发展的角度对先秦史进行整体梳理。文明的诞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本书以“长时段”，从宏观的角度对中华文明的萌发和早期发展历程进行考察。首先对中华文明起源的单一源头说和多源说进行辨析，提出自己的观点；接着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揭示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规律，以期深化相关研究，更好地凝聚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

本书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既可以作为专业研究资料供相关研究者参考，也可以作为介绍先秦史的读物供一般的文史爱好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文明的起源：从史前到先秦 / 吴涛著. —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12

ISBN 978-7-03-063178-7

Ⅰ. ①中… Ⅱ. ①吴… Ⅲ. ①中国历史－研究－原始社会－先秦时代 Ⅳ. ①K210.7 ②K2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57959 号

责任编辑：马 丹 / 责任校对：赵桂芬
责任印制：李 彤 / 封面设计：刘 刚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9 年 12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9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8 1/4
字数：310 000

定价：8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引言　一源与多源 …… 1

第一章　远古时期中国先民的足迹 …… 8

第一节　中华大地早期人类活动的遗迹 …… 8

第二节　北京人 …… 12

第三节　早期智人 …… 14

第四节　晚期智人 …… 17

第五节　旧石器时代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结构 …… 19

第二章　新石器时代的重要考古文化 …… 22

第一节　黄河流域的考古文化 …… 23

第二节　长江流域的考古文化 …… 51

第三节　燕辽地区的考古文化 …… 61

第四节　岭南地区、闽台地区的考古文化 …… 66

第三章　中华古史的传说 …… 69

第一节　华夏的创世纪 …… 69

第二节　古老的三皇 …… 72

第三节　五帝的传说 …… 78

第四节 东夷与苗蛮 …… 90

第四章 上古三代的文明历程 …… 93

第一节 文明门槛的跨越 …… 93
第二节 夏王朝与夏文化 …… 96
第三节 商王朝的兴衰 …… 108
第四节 殷墟与甲骨文 …… 124
第五节 西周王朝的兴衰 …… 136
第六节 西周的国家制度和社会结构 …… 143
第七节 西周的经济生活 …… 151
第八节 西周时期的文化发展 …… 157

第五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明荟萃 …… 166

第一节 大国争霸 …… 166
第二节 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 …… 186
第三节 变法运动与中央集权制度的初步形成 …… 194
第四节 兼并战争与秦的统一 …… 204
第五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 …… 210
第六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发展 …… 221
第七节 百家争鸣：儒家 …… 227
第八节 百家争鸣：道家 …… 252
第九节 法家与墨家 …… 264
第十节 华夏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 277

结语 …… 283

后记 …… 28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引言
一源与多源

中华民族是这个世界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中华文明也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之一。

关于中华文明的源头，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一源与多源的争议。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华文明的源头是单一的，就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不过近代以来的新观点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源的，中华民族的起源是满天星斗式的。

一、传世文献对文明起源的记载

由传世文献所记载的中国古代历史来看，中华文明的起源非常清晰：以轩辕黄帝为代表的华夏先祖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所开创的文明，一直都被看成是中华民族的根源所在。周边各族，为了获得华夏族的认同，往往将自己的祖先与华夏族进行攀附。比如楚人宣称自己出自黄帝之孙颛顼，是祝融之后。越人则宣称自己是“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1] 后来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后，为了获得中原民众的认同，也往往采取这样的策略。比如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2] 鲜卑族自称：“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3] 长期以来，这些观念都被看成

1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739 页。以下引文同一版本不再标注版本信息。

2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 2879 页。

3 魏收，《魏书》卷一《序纪》，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 页。

了基本常识，从来不曾受到过怀疑。

二、近代“疑古思潮”对传世文献记载的冲击

近代以来，学界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逐渐产生了一些争议。首先是近代“疑古思潮”的冲击。“疑古思潮”起源于清朝末年，与维新变法有一定的渊源。清朝末年康有为等人主张变法求强，为了给变法制造舆论，康有为先后写了两本书，《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称两千年来人们所尊奉的儒家经典《左传》《周礼》《毛诗》等都是西汉末年刘歆伪造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王莽篡权而制造理论依据。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说，即便是当年孔子亲自编定的经典，也是靠不住的，那是孔子为了托古改制而创作的结果。而且他认为，不仅孔子，先秦诸子无不托古改制。康有为当然是从政治的目的出发而立论的，不过经历了康有为的冲击以后，儒家经典的权威性受到空前挑战，由儒家经典所构建起来的中华古史系统的根基被动摇了。康有为的观点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他最初的预想。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中国人认为古代历史的框架就是由这些儒家的经典所构建起来的，尤其是唐、虞、夏、商、周时期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圣人在中原地区所创造的辉煌。而如今，康有为告诉人们这些经典都是假的，分别是刘歆和孔子出于不同的目的所伪造出来的，那么由这些经典所构建起来的古史自然也就成了问题。

康有为这些观点起到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之功用，近代“疑古思潮”就是在康有为等人的这些观点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疑古思潮”的代表人物有崔适、钱玄同等人。当然，“疑古思潮”的最重要代表人物要数顾颉刚了。顾颉刚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就古史”说，他认为时间越靠后，人们观念中古史越长，而且越往后，古史的记载越系统、越整齐、越详细，中心人物越是不断被放大，这是后人不断积累添加整理的结果。他说：“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1] 顾颉刚通过细致的文献梳理发现，在春秋时期，关于黄帝的观念还未形成，而到了战国时期，黄帝的传说已经基本成形；战国时期，关于三皇还很模糊，而到了秦汉，三皇的传说也丰富起来了。越是到后来，人们所知道的古史越长，越到后来，人们对于上古所传说的

1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书店据朴社 1933 年版影印，第 52 页。

内容叙述得越丰富，说明这些古史传说都是后人不断添加上去的。在疑古者看来，上古三代的历史本就是一个模糊的影子，遥远的三皇五帝更是一个传说而已，那是后人对古史进行不断整理之后的结果。那么，无论是伏羲画卦、黄帝征伐还是大禹治水，都不过是虚幻的传说而已。

顾颉刚的“层累造就古史”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就说：“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他所提出的夏禹的问题，之前曾哄传一时，我当时耳食之余，还曾加以讥笑。到现在自己研究了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识见是有先见之明的。”[1] 顾颉刚的这些观点极具冲击力，对中华古史系统的冲击几乎是颠覆性的。无论是态度相对激进的人还是相对保守的人，都不能忽视“疑古思潮”的存在，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疑古思潮”的洗礼。比如充满文化保守主义色彩明显的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大体上研究古史，应有其相当之限度，凡及年历、人物、制度、学术等等，过细推求，往往难得真相。”[2] 同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也说：“研究历史，尤当涤除旧念，着眼于人民之进化，勿认开务成物，为一人一家之绩也。”[3] 甚至人们一度怀疑夏商是否存在，后来殷墟的发现否定了人们对商的怀疑，一直到二里头文化的发现才终结了人们对夏的怀疑。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中华文明起源地的地位开始受到怀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疑古思潮”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但它的影响依然存在。一些代表性的通史著作在书写上古历史的时候，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它的影响。比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中提到尧舜禹时说：“关于他们的传说，比黄帝以下诸帝更多些，真实性似乎也大些。”[4] 在这里，他对尧舜禹传说真实性的判定用了“似乎”一词。

三、近代田野考古成果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

另外，近代以来，中国田野考古从无到有，田野考古的成果也促进了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近代对上古考古的重要发现一开始主要出现在黄河流

1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92 页。
2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9 页。
3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4 页。
4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92 页。

域，比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些考古文化遗址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传世文献对华夏文明起源的记载。但后来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开展，重要的考古成果开始不断在各地出现。比如在长江流域先后出现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薛家岗文化、崧泽文化等，在辽河流域也发现了红山文化等重要文化遗址。在这些遗址之中，往往都有惊人的发现。比如，在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遗址都发现了大量稻作的痕迹；在良渚文化遗址之中大量玉器的出土，不仅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有了宗教的观念，而且当地也很可能出现了国家的萌芽；红山文化的发现，逐渐改变了人们对塞外的蛮荒印象。

于是，对于中华文明起源，学界逐渐形成了新的观念，即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如满天星斗一样出现在华夏大地上的。比如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不仅专列一章名为《满天星斗》，而且也再次重复了他对红山女神像的赞美："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1]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源头的说法。很多通史教材也往往如此叙述，使得中华文明满天星斗式的起源说更加深入人心，逐渐成为新时代人们关于上古历史的常识。而且一些地方也都将本地的史前考古发现当成重要的文化资源进行宣传，文化本位意识非常强烈。很多地区开始强调本地考古发现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意义。

四、新时代背景下对文明起源的再探索

20世纪末，伴随着经济的腾飞，文化自觉逐渐显现，出现了"文化热""国学热"。传统文化再度受到关注，人们对于文化的热情前所未有地高涨。作为民族自身文化意识的觉醒的一个显著标志，"寻根热"开始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也再次成为学术界和社会关注的热点。

（一）走出疑古时代

近代"疑古思潮"疑古过甚之弊前人已经充分指出，但对"疑古思潮"并不能简单否定。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疑古思潮"，尤其是顾颉刚的"层累地造就古史"说，虽然具体观点不无可商榷之处，但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古人

1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4页。

历史书写的真相。顾颉刚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中谈到清末今文经学的时候曾说道："清代的今文家自己的建设固然不足取，但其对于古文家的骗局的破坏工作实在是非常的精当，为讲汉代学术思想史的人所不该不取之材。"[1]其实，这句话倒是可以用于近代"疑古思潮"本身。"疑古思潮"的价值在于思想解放，而不在于具体的观点。"疑古思潮"的巨大作用在于，扫除了人们研究古史的许多障碍，使得人们重新以科学的眼光审视古史成为可能。今天研究古史，不能忽视"疑古思潮"的存在。但是，人们常讲"不破不立"，破的目的在于立，"疑古思潮"则破有余而立不足。正如李学勤在《走出疑古时代》一书中所说："'疑古思潮'在思想史上起过很大的进步作用，但因怀疑过度，难免造成古史的空白。这一思潮的影响深远，要对古代历史文化做出实事求是的研究，不能不摆脱有关观点的约束。"[2]要肯定近代"疑古思潮"的价值，但在具体的观点上，则是到了要"走出疑古"的时代。

今天对华夏文明起源的探索，就是建立在对"疑古思潮"再认识的基础之上。经历了"疑古思潮"的洗礼后，人们谈论中华文明之源的时候，将会更加审慎，更加科学，把论断建立在科学考证的基础之上。这将使得人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论断更加坚实可靠。

首先，必须在近代"疑古思潮"的基础上对传世文献中上古史的传说进行重新审视，绝对不能再简单地将传说当成信史。必须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疑古简单地向信古回归。就如同冯友兰在《古史辨》第六册"序言"中所说："我曾说过中国现在之史学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就其中信古一派，与其说是一种趋势，毋宁说是一种抱残守缺之人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即要消灭；即便不消灭，对于中国将来的史学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真正的史学家，对于史料没有不加以审查而即直信其片面价值的。疑古一派的人，所做的工作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做的工作，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就整个史学来说，一个历史的完成，必须经过审查史料及融会贯通的阶段，历史方能完成。"[3]所以，如果直接拿传说当信史，不仅不能对中华文明起源做出正确的认识，还会贻笑大方。当下需要的不是"信古"，而是在经历"疑古"之后的"释古"。

1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 年版，第 75 页。
2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 页。
3 罗根泽，《古史辨》（第六册），上海书店据开明书店 1938 年影印，第 1 页。

其次，历史唯物主义是重建中华古史系统的基本方法。对中原文化根源性的重建必须是建立在对近代疑古思潮成果的充分吸收的基础之上，剔除三皇五帝传说中荒诞的成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上古的传说进行再解读。虽然传说中有后人虚构和想象的成分，但是这些历史传说并非向壁虚构，传说的背后也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也即人们常说的“史影”。比如黄帝的传说在中原一带广泛流传，河南省新郑、新密等地都有黄帝曾在当地活动的传说，虽说不能直接拿传说当史实来用，但这些传说也都反映出丰富的信息。新密市刘碧镇的云岩宫，传说是黄帝讲武之所。虽说传说不可以信据，但1949年之后，在云岩宫周围的确发现了好几处仰韶文化遗址。据《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的报道，新发现的新砦遗址也在距离云岩宫不远处。[1]这些都说明了中原地区关于上古史的传说绝非空穴来风，需要对它们进行去伪存真的再审视。今天综合运用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考古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完全可以重建中华古史的谱系。尤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更是为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站在今天的立场上考察“疑古思潮”，就会发现“疑古思潮”中的很多观点都经不起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比如，关于黄帝，虽然传统典籍中关于黄帝的记载都不能当成信史来看待，但今天来看黄帝，就不能仅把他当成一个传说。要看到传说背后有历史的影子的存在。作为一个具体的个人，可能他有虚幻的成分，但是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作为一个文化的符号，他是真实的。现代考古学一般都将龙山文化与传世文献中的黄帝时代相对应，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在证明着这一论断。所以，今天完全可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综合利用考古材料和传世文献，重新建立起中华民族的古史系统。

（二）考古发现的再认识

近代以来考古发掘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长江流域和燕山辽河地区的重大考古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传统的一些观念。对于这些考古成果，绝对不能视而不见，必须对它们进行再认识。

首先，长江流域、燕山辽河地区的重大考古发现，应当与中原地区的考古发现一同纳入到一个整体的框架之中。中华文明在中原地区的突破，并不是偶然的爆发，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的积淀。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

1 赵春青、顾万发、王文华，《河南新密新砦遗址1999年试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并不是要割裂史前时期各地文化之间的联系和交流。现代考古学已经证实，在史前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化发展不可能是绝对孤立的。无论是仰韶时期，还是龙山时期，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之间都存在比较密切的文化联系，他们之间表现出一定的共性。他们之间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方面，有着不同的发展途径。不过，由于中原所处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中原地区往往成为文化交流的中心枢纽。比如，考古发掘证明龙图腾在中原地区最后的定型，就是汇集了很多的文化元素。正是各地文化向中原的汇集，才使得龙山时代中原地区的文化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并最终告别了蒙昧，进入到文明时代。

其次，源是相对于流而言的。没有实现传承的文化，对于今天的中华文明而言，不具有根源性意义。一些地区的史前文化，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成为绝响，对后世的发展并不起多大作用。

最后，再回过头来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一源与多源问题。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中华文明的起源经过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史前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的文化积淀最终促成了中华文明的起源。不同地区的史前文化，都或多或少地对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一定的贡献。因而，可以说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源的。但同时也要说，中华文明的起源也是一源的。在众多考古文化中，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史前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众多史前文化在这里交流、汇聚，最终在中原地区，中华民族跨越了文明的门槛，开启了中华文明伟大的历史征程。

第一章
远古时期中国先民的足迹

近代以来，伴随着田野考古事业的发展，先民在中华大地上筚路蓝缕开创文明的足迹逐渐展现在世人的面前。[1]

第一节　中华大地早期人类活动的遗迹

中国地处亚洲的东部，自然环境优越，是世界上最早出现人类活动的地区之一。现有的考古成果基本构建起从猿到人的进化链条，中国已成为探索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

一、开远腊玛古猿和禄丰古猿

关于现代人类的起源，古生物学家普遍认为人是由猿进化而来的，从猿到人经历了古猿、能人、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等不同的发展阶段。从猿到人进化过程也成为人们的一个常识，但是，对于现代人类的源头是单一的还是多源的，学术界并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长期以来，人们都将非洲看成人类的起源地，将在非洲发现的南方古猿看成是现代

1　本章参考了王幼平《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部分内容，文物出版社 2000 年版。

人的前身。但是在中国云南的发现，正在对这一看法提出了挑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古生物学家的研究证实，人类是从猿进化而来，人类的直系祖先是森林古猿。它们就像黑猩猩那样过着群体生活。森林古猿如何向人的方向发展，曾有过种种推测，其中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由于气候变化，使森林地区林木逐渐稀疏，森林面积缩减，树丛间出现了空地，这就为森林古猿提供了到地面上活动的条件，逐渐由树居生活向着地面生活过渡。森林古猿在剧烈的生存斗争中，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部分森林古猿体质特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体型变大，骶骨也变得厚大，骶椎数增多，髋骨变宽，内脏和其他器官也相应地变化了，从而为直立行走创造了条件。他们的下肢更适于直立行走，双手日益灵巧。他们已经学会了使用工具，并且还会制造一些简单的工具。森林古猿还属于猿的范畴，他们生活于两千三百万年到一千万年以前。

在中国发现最早的古猿化石，是1956年在云南开远发现的腊玛古猿。1956年到1957年，在云南开远县小龙潭第三纪褐煤层里，两次共发现古猿牙齿化石10颗。前一次发现的5颗牙齿，是属于同一个下颌的左、右前臼齿和臼齿；后一次发现的是下颌右侧的前臼齿和臼齿。地层年代测定为中新世晚期。起初，这些古猿化石全部被划归为森林古猿类，定名为“森林古猿开远种”。后来学术界重新综合研究以后，把腊玛古猿（腊玛古猿最早发现于巴基斯坦和印度交界的西瓦立克山区）从森林古猿中划分出来，明确地归入人的进化系统——人科，作为人科的早期成员。我国开远古猿化石，被认为是属于腊玛古猿的，应归属为人科。开远古猿化石对于我们探索人类的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开远腊玛古猿生活在距今一千多万年以前。[1]

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于云南禄丰县的禄丰古猿对于探索人类的起源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禄丰古猿已经属于正在形成中的人。1975年到1980年，在云南禄丰县石灰坝的第三纪褐煤层里发掘出不少古猿的化石，包括了一个破裂成数十块的头骨，头骨上连有部分上颌骨和牙齿；若干块颌骨，其中一块为保存着除中门齿以外的全部牙齿的下颌骨。除此之外，还发现上百颗单个牙齿。那块完整的下颌骨具有从猿到人转变过程的一些重要特征；它的形态比开远腊玛古猿更进步，更接近人类的早期类型。含禄丰古猿化石的

1 张兴永、郑良、肖明华，《从开远腊玛古猿的形态特征再论滇中高原与人类起源》，《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地层年代，为早上新世晚期或中上新世早期，距今约 800 万年。禄丰古猿化石的发现表明中国的华南地区应当是人类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对人类起源非洲中心说提出了挑战。[1]

二、繁昌人、巫山人、元谋人、蓝田人

（一）繁昌人

目前已知在亚洲地区最早的古人类活动遗迹，是繁昌人遗址。1998 年在安徽繁昌县孙村镇一个被称为“人字洞”的熔岩型洞穴中发现了大量人工痕迹清楚、打击点明显的骨制品和石制品，显然曾有古人类在此活动，有学者将他们称之为“繁昌人”，他们的年代在距今 240 万年到 200 万年之间。不过，在繁昌并没有发现人类化石。[2]

（二）巫山人

亚洲地区已知所发现最早的古人类化石，是 1984 年发现于四川省巫山县（今重庆市巫山县）庙宇镇龙坪村龙骨坡遗址的巫山人化石。1984—1988 年，考古工作者在四川省巫山县龙骨坡一洞穴堆积层里，发掘出一个人类门齿和一段人类下颌骨，颌骨上带有两个牙齿。在发现以上化石的同一层位，除发现人类加工或使用过的骨器外，还发现了巨猿及其他 110 多种哺乳动物的化石，这在世界古人类发掘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经检测，它的年代为距今 204 万年到 201 万年之间。

古生物学家认为巫山人属于“能人”。能人的形态特征是：他们很矮，高度不过 144 厘米，门齿、犬齿较大，前臼齿比纤细型南方古猿窄，锁骨与现代人相似，手骨和足骨比现代人粗壮，头骨的骨壁薄，眉脊不明显，脑容量大约为 680 毫升。能人已经能够进行石器的打造。[3]

（三）元谋人

我国境内所发现最早的直立人是发现于云南的元谋人。1965 年，钱方、浦

1 郑良，《禄丰古猿：人科最早的成员？》，《中国文化遗产》2008 年第 6 期。

2 金昌柱、韩立刚、魏光飚，《安徽繁昌县人字洞发现早更新世早期旧石器》，《人类学学报》1999 年第 1 期。

3 可参看黄万波、方其仁，《巫山猿人遗址》，海洋出版社 1991 年版。

余庆等学者到上那蚌村附近寻找化石。他们在一位牧牛老人指点下，来到蚌村以西约 1 千米的山沟里寻找化石。下午 5 点钟，有人在一个土包下发现了两颗人类的门齿。1973 年 10 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组织了大规模发掘，在附近地层发现了人工打制的石器和炭屑、哺乳动物化石等。[1] 1976 年 7 月 25 日，用古地磁方法测定其绝对地质年代为距今 170 万年左右。[2] 这次发现的化石是属同一青年男性个体的左、右上内侧门齿两颗，定名为“元谋直立人”，简称“元谋人”。元谋人化石是中国境内已知最早的人类化石，属早更新世人类。这一观点为多数人所接受。

经过多年发掘，总共出土石器 17 件，主要用锤击法制成，加工方法粗糙。化石产地中发现有许多哺乳动物肢骨碎片，有的碎片上有明显的人工切削等痕迹。元谋人已经会使用自己制造的工具从事狩猎及采集活动。伴随这些骨片还有一些烧骨和大量炭屑，说明元谋人已懂得用火了，用火烤食他们所获取的猎物，开始摆脱茹毛饮血的时代。

（四）蓝田人

1963 年在陕西蓝田县陈家窝发现一个完好的古人类下颌骨化石；1964 年蓝田县公王岭又发现一个不很完整的古人类头骨化石。过去总是笼统地将这两次发现的古人类化石称之为蓝田猿人化石，现在学术界比较倾向于对这两次发现分别命名。其中蓝田人，主要是指的发现于公王岭的古猿人。据研究，公王岭化石层的年代约距今 100 万年到 110 万年之间。经测定，蓝田人的脑容量约为 780 毫升，而且眉脊骨特别粗大，前额低平，嘴部突出，牙齿较大。这些形态特征说明他们的体质还有较多的原始性。在陈家窝所发现的化石为一老年女性下颌骨化石。陈家窝遗址的年代约为距今 65 万年左右。[3] 蓝田人石制品的原料除极少数为脉石英外，绝大多数是采自当地河滩的石英岩砾石制成的。他们用简单而粗糙的方法打制石器，包括大尖状器、砍砸器、刮削器和石球等，在自然环境中挣扎求存。他们捕猎野兽，采集植物果实、种子和块茎等为食物。[4]

---

1 文本亨，《云南元谋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收《古人类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1978 年版。

2 钱方，《关于元谋人的地质年代问题——与刘庆东等同志商榷》，《人类学学报》1985 年第 4 期。

3 安芷生、高万一、祝一志，《“蓝田人”的磁性地层年龄》，《人类学学报》1990 年第 1 期。

4 游学华，《陕西蓝田人研究综述》，《历史教学》1980 年第 8 期。

元谋人和蓝田人都属于早期直立人。直立人已经能直立行走，而且能制造工具，直立人已经有了掌握有声语言的能力，也具备了比较复杂的文化行为能力。

第二节 北 京 人

一、北京人的发现

北京猿人遗址是我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影响最大的古人类遗址。北京猿人又称“北京人”，其科学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早在1921年，科学家就发现了位于北京西南周口店的这处遗址。1929年12月2日，中国学者裴文中在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里，发掘出第一个完整的古人类头盖骨化石，他兴奋地断定，这是远古人类的遗骨。截至1966年，考古工作者在周口店又先后发现五个比较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和一些其他部位的骨骼化石，还有大量的石器和石片等物品，共十万件以上。北京人遗址是世界上出土古人类遗骨和遗迹最丰富的遗址。[1]

北京人遗址发现的化石，共有头盖骨6个，头骨碎片14块，下颌骨15块以及一定数量的股骨、肱骨、牙齿等，大约代表40多个个体。北京猿人与蓝田猿人相比，脑壳较薄，脑量增大，其平均脑量为1059毫升，最大的约1225毫升；虽说北京人的脑容量仍小于现代人的1400毫升，但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北京猿人前额稍高，眉脊骨稍小，嘴部也略微向后收缩，头骨枕部窄而长，外部轮廓呈椭圆形，仍带有较明显的原始性。北京猿人相对现代人较矮，成年男性平均1.62米，成年女性平均1.52米。北京人四肢骨已比较接近现代人。北京猿人的绝对年代约在距今70万至23万年之间，持续达40万年之久，属中更新世中、晚期。[2]

北京人所用石器的原料有脉石英、绿砂岩、石英岩、燧石和水晶等，制法有锤击法、碰砧法和砸击法，并已懂得对不同的石料采用不同的制法。石器个体大多较小，主要类别有刮削器、尖状器、砍斫器、雕刻器和石球。大多数是

1 贾兰坡、黄慰文，《周口店发掘记》，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版。

2 赵树森、裴静娴、郭士伦等，《北京猿人遗址年代学的研究》，收《北京猿人遗址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9、240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